

拉美專題

拉美民主化進程中的經濟因素

萬瑜，復旦大學拉美研究室博士後

摘 要：

縱觀拉美的民主化進程，其民主與專制的週期性社會震盪持續了一個多世紀。這取決於其經濟發展水準與民主化的關係。儘管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沒有必然、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有很強的相關性。因此，民主化進程中的經濟因素不容忽視。本文針對拉美國家經歷的三次民主化浪潮及其經濟因素進行了深入探析。

關鍵字：拉美；民主化；經濟因素

縱觀拉美的民主化進程，其發展可謂是一波三折。自 19 世紀中後葉以來，拉美國家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民主化進程，其民主與專制的週期性社會震盪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經歷的三次民主化浪潮引人深思。

拉美民主化進程的發展取決於其經濟發展水準與民主化的關係。在比較政治學的發展理論研究中，主要有三種關於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關係的理論——衝突說、相容說和懷疑說。

有學者認為，對於拉美國家來說，經濟上的成功使權威主義政權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而在經濟成功之後出現的經濟失敗則為權威主義垮臺提供了一個契機，迫使他們把權力還給文人政府。但是，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拉美在其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最迅速的時期，發生了一連串軍事政變，幾乎整個拉美都處於軍事獨裁統治之下。由此可見，拉美國家的政治民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簡單的以「衝突說」或「相容說」所概括其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來闡釋拉美民主化進程是不夠具體和深入的。因此，處於上述兩種理論觀點之間的「懷疑說」特別值得注意。對於這一理論，根據索儒森(Georg Soreusen)的分析研究，發展中國家裡威權或獨裁專制政權與民主政體在政治參與、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方面可以有不同的變數組合。不同的政治體制可以和不同的經濟政策組合，而產生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果。簡而言之，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並沒有必然、直接的因

果關係，但有很強的相關性。因此，民主化進程中的經濟因素是不容忽視的。

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及其經濟因素

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始於拉美獨立戰爭。19 世紀初，由於深受北美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尤其是法國啟蒙思想家關於民主、自由、人權等主張所發揮思想啟蒙的催化作用，拉美人民推翻歐洲殖民者的鬥爭熱情迅速高漲。

1804 年海地宣佈獨立，揭開了拉美獨立戰爭的序幕。到 19 世紀中葉，除古巴、波多黎各外，拉美其它的法、西、葡屬殖民地均宣告獨立。這場戰爭不僅摧毀了歐洲殖民者的統治，更重要的是把歐洲的民主制度引進到拉美。因此，這次民主化浪潮是以民族解放、建立民主共和政體為核心內容的。

拉美獨立運動的領袖們，懷著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極大熱忱，力圖借鑒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觀點來創建自己的共和國。他們從歐美引進了西方的代議制民主政治制度，並紛紛建立了議會，以法、美兩國憲法為藍本制定了憲法，明確規定了各項民主原則（如公民自由權、分權制等），要求建立代議制政府等，但這些在現實面前遇到了嚴峻挑戰。由於拉美國家長期處於西班牙、葡萄牙這類自身尚未實現政治現代化的宗主國的封建統治下，因而缺乏政治民主的傳統。再加上它們在獨立後資本主義經濟的根基極不穩定，這些問題都成為這些革命者實現政治民主化的重重障礙。「但早期的領導人卻大多不諳國情，熱衷於推行西方民主制，美國的聯邦制和英國的自由貿易制，反而延長了國內分裂和混亂的局面」。這樣，由於殖民地的封建專制傳統、天主教與傳統專制的政治聯盟以及軍人集團和軍事組織的深遠影響，由少數精英分子所引進的西方民主制度在拉美發生了畸變，被一種獨具拉美特色的政治制度——考迪羅制所取代，形成了一個「考迪羅主義時代」。考迪羅制實際是一種在共和制外衣包裝下的軍閥獨裁體制。正如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所說：「談到政治現代化，沒有比軍人干預政治這一點更為引人注目和司空見慣了。軍人政府和軍人政變、軍人反叛和軍事政權一直是拉丁美洲國家中綿延不斷的現象」。

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的結果不甚理想，出現了從早期的民主努力到考迪羅威權主義政治統治的轉變。這與其進程中的兩個主要經濟因素密不可分：

一、殖民地時期的社會經濟結構

從社會變革的深度來看，19 世紀初期掀起拉美民主化浪潮的獨立戰爭雖然採取的是武裝鬥爭這一革命鬥爭的最高形式，但它基本上只是一場保守的運動，其結果只是政治層面上的變動，而經濟與社會結構原封未動。因此，儘管歐洲民

主制度隨著獨立戰爭的砲火被移植到了拉美的土地上，但這塊土地還並不具備民主制度生根開花的條件。其根本原因在於，雖然戰爭結束了歐洲殖民者的統治，卻沒有從本質上摧毀遺留下的社會經濟制度。所以，拉美各共和國在獨立後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十分薄弱，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也十分軟弱。

與此同時，在殖民地時期被西班牙王室分封土地的監護主，由於各國的獨立失去了殖民政府的保護。面對獨立戰爭後的政治混亂、經濟停滯的無政府狀態，為了維護自己漸失的特權，他們靠其統治下的農民自己組成武力集團，並從地方政府得到委任狀取得合法的外表，再通過選舉或暴動掌握地方的政權，成為控制一方的政治強人。各個小集團相互結合或吞併，形成以考迪羅為首領的更大區域組織。可見，殖民時期的社會經濟結構是造成考迪羅專制獨裁制度在當時唯一可行的重要因素。

二、世界現代化浪潮的國際經濟環境

在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興起之時，世界第一次現代化浪潮（即從英國工業革命開始然後向西歐擴散的現代化浪潮）還沒有結束。但由於新獨立的拉美各國不具備政治穩定這一參加現代化的重要條件，而被排除在第一次現代化浪潮之外，成為現代化中心國家的週邊或邊緣。直到 19 世紀後半期歐美發達國家出現第二次現代化浪潮（即歐洲新技術革命和工業化新浪潮）的時候，拉美國家才開始真正融入世界現代化浪潮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其民主化進程深受這一因素的影響。

19 世紀 50 年代以後，在世界第二次現代化大浪潮的推動下，尤其是外國資本（主要是英國資本）的流入，拉美國家作為原材料和農產品出口國擁有了加入全球經濟的機會。在整個 19 世紀下半葉，拉美地區的貿易由於工業化國家需要購買更多的農礦產品經歷了引人注目的增長；另一方面，由於歐洲國家為了確保提高其工廠和城市人口所需求的農礦產品的產量，源源不斷地向拉美國家輸送資本、技術和人才，導致外國在拉美的投資日益增加。要充分利用這些經濟因素，政治穩定是必要條件。對此，拉美國家的領導人和外國投資者十分有默契，都希望能在拉美建立一種有能力維持穩定以支援出口發展模式的政府體制。之前在世界第一次現代化浪潮中得到的教訓證明從西方引進的代議制民主體制在此時並不適合。所以，到 19 世紀末，拉美地區普遍出現了被稱為「秩序與進步獨裁者」的考迪羅高度集中的獨裁制度。事實證明，在世界現代化浪潮的國際經濟環境的外力作用下，拉美國家經濟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其社會和政治的變革。

拉美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及其經濟因素

拉美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始於 20 世紀 20 年代，表現為平民主義的興盛。「平

民主主義是由希望發展工業（其根本目的是實現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工業資產階級同工人、城市中間階層和知識份子等結成聯盟，以加強自身主導權的新型政治思潮，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美人民反獨裁爭民主運動的衝擊下的結果，預示著統治拉美近一個世紀的考迪羅主義開始走向衰落，是考迪羅主義衰敗過程中拉美走向民主化的主流思想。「它雖還不是民主制度，但政權有著廣泛的民眾基礎」。到二戰後，拉美民主化浪潮進一步高漲，僅 1944 年和 1945 年就先後有古巴、薩爾瓦多、哥倫比亞、瓜地馬拉、秘魯、委內瑞拉和巴西等國的軍人政權被迫辭職。到 1959 年，拉美僅剩下 4 個軍人政府，創歷史最低紀錄，達到這一時期拉美民主化嘗試的頂點。以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為代表的拉美國家在這一時期建立了一種被稱為民眾主義的政體，它遠比考迪羅制寬鬆、自由和民主，體現了工業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工人和知識份子等社會階層希圖發展的願望。雖然它還不能算是完全意義上的民主政體，但卻擁有較為廣泛的民眾基礎，將拉美政治民主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遺憾的是，拉美國家隨後遭遇了一次其民主命運的低潮。20 世紀 60 年代，拉美各國民民主化進程再度受到挑戰，原有的民主趨勢出現大的倒退。民眾主義政體並沒有直接發展成現代民主制度，而是再次倒退到軍人獨裁政權。首先是 1962 年阿根廷和秘魯政府被軍人推翻，接著厄瓜多爾軍人在 1963 年奪權，此後巴西、玻利維亞、巴拿馬等國軍人先後政變上臺，就連號稱拉美「民主櫥窗」的智利和烏拉圭也發生了軍事政變，建立了軍人獨裁政府。到 20 世紀 70 年代初，除墨西哥、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五國外，拉美幾乎成了威權主義的一統天下。

與第一次民主化浪潮的情況相似，拉美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再次經歷了一個大的「民主——專制」週期。但不同的是，拉美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上演的是從新民主政治（已不是舊的民主制，而是新的民主制，即民眾主義民主制）到新威權主義政治（已不是舊的考迪羅主義專制獨裁制度，而是軍人政權的新威權主義制度）的轉變過程。這是由這一階段特定的各種經濟因素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自身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 30 年代，拉美經濟在現代化的推動下高速發展。現代化帶來了物質和技術的進步，人口遷移、農業的機械化、商業化使拉美出現了人口增長和城市化。20 世紀初，里約熱內盧、布宜諾斯艾利斯、加拉加斯、聖地牙哥、墨西哥城等都發展成為重要的大城市。因此，拉美的社會經濟結構也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出現了影響力越來越大的兩個階級：中產階級和城市工人階級。中產階級在拉美主要國家中發展很快，到 19 世紀、20 世紀之交，已占人口總數的 10%。這意味著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具廣泛基礎的新的社會政治力

量從下層發展起來。面對自主現代化的宏偉經濟目標，如何對待這兩個新興階級成為拉美政治發展最關鍵的問題。此時所需要的新的政治系統必須是強大的，因為它必須有能力創新政策，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並且將現代化改革所催生的各種新的社會力量成功地納入政治體系之內以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在這一過程中，為了減緩客觀存在的利益分配上的尖銳鬥爭、創造自身政治優勢，許多拉美國家都在 20 世紀中期進行了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建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民主制度——民眾主義政治制度，這一嶄新的政治制度把工農民眾、特別是城市工人階級吸納進了政治體系，壯大了政權的社會階級基礎。墨西哥的卡德納斯主義政治制度、巴西的瓦加斯主義政治制度和阿根廷的庇隆主義政治制度等等都是其典型。

二、第一次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引發的內部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20 世紀 30 年代對於拉美的民主化進程來說具有重要意義。在這一時期爆發的第一次世界規模的資本主義發展性經濟危機是其最明顯直接的經濟因素。這次經濟大蕭條給了拉美特別沉重的一擊，使其早期現代化所採用的初級產品出口發展模式破產。由於國家的財政基礎在這次經濟危機中被嚴重動搖，因此公眾對於文人政權的支持度也隨之大大減少。在日益壯大的工人階級面前，文人政府的統治階級精英們陷入了如何解決危機以及正在進行的經濟與社會變革問題的困境。

在這種情況下，軍人以獨裁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的姿態登上了拉美的政治舞臺。新的國家領導人轉向了一種自主、自強的工業化經濟發展模式，開始了一場以加速社會經濟變革為目的、以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為核心的現代化運動。由此可見，在這個時期建立的拉美軍人政權較以前的軍人統治受到更多經濟元素的影響，帶有強烈的發展主義傾向，致力於追求國家的現代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它們認為對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進行全面的改革、全力發展經濟、吸引外國投資者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奉行這種新威權主義制度的拉美國家政府以強有力的軍人獨裁統治排除政敵的干擾，從而推進拉美的現代化。

拉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及其經濟因素

1974 年，隨著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歐洲最後三個威權政體的倒臺，民主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震撼著整個世界，拉美也在這一世界民主化的大背景下，成為勢頭最猛、範圍最廣、對專制統治衝擊最大、在世界範圍內影響最大的地區。20 世紀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席捲整個拉美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拉開了帷幕，國家重新回到代議制民主軌道。這次浪潮最早出現在巴拿馬。1978 年，巴拿馬通過選舉開始由文人擔任總統。1979 年，尼加拉瓜人民推翻了索摩查家族長達

42 年之久的專制獨裁統治，成立了文人政府。進入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拉美民主化發展猶如多米諾骨牌倒塌一樣一發不可阻擋。從 1980 年開始，先後有秘魯（1980 年）、宏都拉斯（1982 年）、玻利維亞（1982 年）、阿根廷（1983 年）、薩爾瓦多（1984 年）、烏拉圭（1984 年）、巴西（1985 年）、瓜地馬拉（1985 年）、海地（1986 年）以及蘇里南（1988 年）等國通過大選結束獨裁統治。

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拉美從 60 年代開始建立並苦心經營的各種威權政體幾乎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各種軍人政權紛紛讓位民選政府，還政於民。經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洗禮，現在拉美地區除古巴等極少數國家外，大都實行的是民主憲政政體，各國基本都建立了民選的文人政府，民主化的發展在拉美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經濟發展的實質程度與短期的經濟危機或失敗相結合是最有利於威權政權向民主政府過渡的經濟公式。究其深層次原因，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經濟因素最為基本。

一、全球性經濟危機對拉美經濟的嚴重影響

雖然之前的威權主義政體促進了拉美的經濟增長，但 1973 年由石油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給拉美經濟帶來嚴重影響，造成拉美各國經濟形勢惡化。其具體表現為經濟發展速度減慢，收入分配更加不平衡，外債極速膨脹，通貨膨脹居高不下。以外債為例，1950—1960 年拉美外債一直沒有超過 100 億美元，1970 年也只有 207 億美元，但到了 1977 年就突破了 1000 億美元，1980 年突破 2000 億美元，1982 年則接近 3000 億美元。

通貨膨脹也直線上升，從 1971 年的 15.5%，上升到 1975 年的 40.7%，高居全球之冠。消費物價指數也是扶搖直上，如以 1975 年為 100%，1980 年增到 740.7%，1981 年又升至 1206.8%。如此惡劣的經濟態勢給拉美各國的民生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起，拉美各國人民反對軍人獨裁爭取民主的鬥爭的情緒再度高漲，威權主義政權如履薄冰，最終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強有力的衝擊下紛紛垮臺。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拉美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

對於拉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來說，二戰後其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是根本原因。經驗證明，「在窮國，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富國民主化已經發生過了，在兩者之間有一個政治過渡帶」。因此，向民主化過渡主要發生在像二戰後處於中等經濟發展水準的多數拉美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拉美國家在工業化和現代化

的推動下取得了全面的經濟發展。1950—1980 年，整個拉丁美洲經濟年均增長率為 5.3%，30 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 4 倍，工業生產總值增長了 6 倍。這不僅為拉美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提供了經濟基礎，而且也動搖了威權主義的穩定性。在社會經濟方面，之前的軍人政權很少採取措施去滿足社會各階層的要求，因此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以巴西為例，從 1960 年—1980 年，10% 最富有的人口占國民收入比例從 40% 增長到 48%，富裕程度僅次於上者的另外 10% 的人口，收入比例略有增加，從 14.7% 增加到 15.4%，而其餘 80% 人口的收入則有下降。這種嚴峻的局面激化了社會矛盾，使社會各階層期許實現更大程度的社會平等、更公平地分配社會財富的願望愈加強烈，從而直接導致擴大政治參與權以實現國家政治民主化成為焦點，於是更大規模的民主浪潮應運而生。

三、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積極影響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球化所包涵的經濟的擴張和民主的擴張兩種形式成為全球性的兩股巨流。這兩種形式相輔相成，尤其是政治的民主化浪潮最為全球所關注，是全球化最重要的內容。拉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時期正是全球化和拉美地區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的時期。因此，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和拉美民主政治發展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總的來說，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拉美地區政治民主化進程產生了積極影響：

第一，20 世紀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由於世界經濟衰退、盛行的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國際市場石油價格上漲、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暴跌以及國際金融市場的利率調高，最終導致了以 1982 年墨西哥宣佈無力清償外債為肇始的拉美地區嚴重的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因而在政治上加劇了人們對當局的不滿，引發社會動亂，進一步動搖了當時還占統治地位的獨裁政權，加速了威權主義政治制度的終結。

第二，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來，拉美各國之間及拉美國家和美國在經濟上與政治上加強了合作。它們建立的這種密切關係制約了國家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從而形成有利於民主政治發展的和平的大環境。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拉美各國均以追求經濟利益作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使軍事成分的重要性大大減弱，因此軍人政權的瓦解是大勢所趨。

第三，伴隨著全球化的擴展和拉美國家對外經濟關係的不斷發展，「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20 世紀 50-60 年代為準備階段)，拉丁美洲形成了一個新的由經濟領域技術官僚或者由技術政治家組成的跨國階級，他們實行對外開放並使新

的經濟政策模式合法化。這一群體超越國家邊界結成人員之間的聯合(通過共同的海外求學經歷)，其中大多數人曾在美國接受教育(如智利的芝加哥弟子和墨西哥薩利納斯總統周圍的人士)，接受並宣傳美國經濟的主導模式(具有自由主義或是新自由主義特徵的)。」這一新的社會經濟階層成為推動拉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支重要的洲際性政治力量。

第四，拉美地區活躍的區域一體化大大推進了拉美地區政治民主化的進程。拉美經濟一體化組織所協調的內容包括民主政治的鞏固，並且增加了對不民主的政權更替的制裁機制，為拉美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提供了強有力的外部支援。尤其是把自己視為民主國家聯盟的美洲國家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五，經過了 20 世紀 80 年代的債務危機之後，拉美國家的民選文人政府逐漸實現了經濟轉型以及與國際經濟的接軌。這一時期拉美國家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所取得的經濟成就鞏固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成果，駁倒了之前「專制政府比民主政府更容易實施深層次的經濟改革和確保經濟增長」的普遍觀點，使拉美的民主政治獲得了更高的合法性。

從 20 世紀 90 年代至今，拉美這片「民主的大陸」一直在為其民主制度的鞏固努力著。如今在拉美，民主選舉已經成為重要的政治選擇，民主政治制度在大多數國家獲得了高度的合法性和支持度。但由於依然存在著經濟增長不足、兩極分化等諸多問題，拉美的民主政治還要繼續接受嚴峻的考驗。因此，未來拉美民主化進程中的經濟因素仍然值得我們密切關注。

智慧藏